

B942
中华文 化要籍 导读丛书

壇經

导 读

郭朋著 巴蜀書社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坛经导读

郭

朋

巴蜀书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封面题字：顾廷龙

封面设计：陈世五

责任编辑：黄小石

坛经导读 郭朋著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7.25插页2字数130千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00册

书号：2329·7 定价：1.55元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编委会

主编 蔡尚思

编委 陈子展 谭其骧

胡道静 顾廷龙

黄 葵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根深叶茂。今天的中青年同志，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着这一宏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对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用新的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让它在四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是广大中青年应尽的历史责任，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要正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必须从直接阅读古代文化要籍入手，面对这些要籍，不少中青年同志苦于有关文化修养的障碍，亦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深入中国古代文化要籍的堂奥探幽致远，因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扬弃。基于此，我社决定为广大中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这套丛书从中华文化的“根”出发，撷取其中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著作，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分册导读，使广大中青年同志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学习、了解、深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取得较大收获。

这套丛书，重点在“导”，要通过这套丛书引导广大中青年同志正确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引导他们深入发掘曾长期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辉的文化瑰宝；引导他们辨别和扫清窒息人心的文化毒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每本要籍导读的作者，大都约请对该古籍素有研究，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第一流专家担任。

丛书每种一般不超过二十万字，其内容主要分成两部分。首先是导言，这是全书之重点，其中不仅要介绍该要籍的作者与全书概况，而且要介绍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着重从方法上对读懂要籍给予具体指导，即讲解清这部书怎样才能读懂，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将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这部书的途径和应当阅读的有关著作。第二部分是该要籍的精选和简注。导言和简注不仅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同时亦要反映导读者多年的研究之得并适当吸取当前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本丛书由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担任主编，并由蔡尚思、陈子展、谭其骧、顾廷龙、胡道静、黄葵等先生组成编委会，负责指导丛书的工作。

总之，本丛书希望搞出新的风格和特点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帮助解决广大中青年的学习难点，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但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不吝赐教。

目 录

导言	(1)
《坛经》选读	(57)
一、序品.....	(59)
二、惠能说法，惠能闻金刚经.....	(61)
三、弘忍、惠能问答.....	(65)
四、五祖集门人.....	(66)
五、诸人不敢呈偈.....	(68)
六、神秀书偈.....	(69)
七、五祖见偈，神秀未到.....	(71)
八、惠能、童子问答，惠能作偈.....	(73)
九、惠能受法.....	(78)
一〇、惠能向南.....	(80)
一一、惠顺求法.....	(81)
一二、般若之智，人自有之.....	(83)

一三、定慧体一	(86)
一四、一行三昧	(87)
一五、定慧如灯光	(90)
一六、法无顿渐	(91)
一七、无念为宗	(92)
一八、坐禅不著心，不著净	(97)
一九、坐禅一切无碍	(98)
二〇、见自三身佛	(100)
二一、四弘誓愿	(106)
二二、无相忏悔	(107)
二三、无相三归依戒	(109)
二四、大智慧到彼岸	(111)
二五、摩诃义	(113)
二六、般若义，波罗密义	(114)
二七、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	(117)
二八、持金刚经即见性入般若三昧	(117)
二九、小根之人闻法不悟，大智之人能修此行	(120)
三〇、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	(122)
三一、自心内善知识，般若三昧	(124)
三二、发大誓愿，不退菩提，须分付此法	(127)
三三、无相灭罪颂	(128)
三六、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无相颂	(131)
三七、大师归曹溪	(137)
三八、无坛经稟受，非南宗弟子	(138)
三九、南能北秀	(140)

四五、三科法门	(141)
四六、三十六对	(146)
四七、不稟受坛经，非吾宗旨	(149)
五五、坛经传授	(151)
附录	
附录一 《坛经》未选部分目录	
三四、修福与功德别	(153)
三五、西方去此不远	(154)
四〇、志诚来参	(158)
四一、大师为志诚说戒定慧	(159)
四二、法达来参	(160)
四三、智常来参	(164)
四四、神会来参	(165)
四八、大师告别，真假动静偈	(166)
四九、五祖传衣付法颂并大师颂	(169)
五〇、大师二颂	(171)
五一、历代传法祖师	(171)
五二、见真佛解脱颂	(172)
五三、自法真佛解脱颂	(173)
五四、灭后奇瑞，送葬、立碑	(176)
五六、如付此法，须得上根智	(176)
五七、流通品	(176)

附录二

- (1)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 唐释法海撰 (177)
(2) 六祖大师缘起外纪 门人法海等集 (180)
(3) 曹溪大师别传 (182)
附：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 胡适 (194)
(4) 六祖能禅师碑铭 王维 (203)
(5) 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 柳宗元 (206)
(6) 大鉴禅师碑并序 刘禹锡 (208)
(7) 六祖坛经序 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
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 (209)
(8) 六祖坛经序 宋吏部侍郎郎简述 (210)
(9)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 宋明教大师契嵩撰 (211)
(10)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 古筠比邱德异撰 (216)
(11) 跋 宗宝撰 (217)
(12) 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节录) 王起隆 (218)

导　　言

(一)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佛教大体经历了如下的几个阶段：

在汉代（公元一、二世纪间），佛教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它既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对它也颇为陌生。人们把它同当时仍在流行的黄老之学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便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映。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则把它看作是盛行于当时的方式的一种。所以，汉代佛教，虽已开始有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但它却始终未能摆脱初传时期的朦胧状态。而且，汉代佛教，主要活动于以宫廷贵族为主的上层社会之中，还未能广泛普及于民间。当时的出家僧侣，除个别例外，还都是外籍译师，还没有正规的华籍僧人，更没有中国高僧。所以，作为一种宗教，汉代佛教还远不是体态完备的。

魏晋时期（公元三世纪初至五世纪初），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里，不仅译经数量有了大量的增长，而且译经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还出现了中国佛教的义理之学。这标志着：魏晋时期的佛教，已开始了它的“中国化”的进程；它除了佛经的翻译之外，还开始从事于佛教理论的研究了。从而，“义学”名僧辈出，而中国的佛教高僧，从此也就出现在中国佛教的历史舞台上。诸如道安、慧远、法显、道生、僧肇……这些知名当时、影响后世的义学名流（其中，法显还是一位译经大师），已成为当时佛教界的重要人物。这时，佛教不仅有了自己的目录之学（即早期中国佛教的《经录》），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注释之学。虽然当时的佛教显学《般若》学，深受玄学的影响，以致一度出现了玄学化的现象，但是，魏晋时期的佛教，毕竟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了。特别是，曹魏之后，中国佛教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传戒制度，专门传授出家僧人们的戒律，从此，出家僧人，不再只是“剃发”、“袈衣”，而且也能依法受戒了（受了出家的“比丘戒”——共二百多条，方才算是正式的“合格”僧人）。有了正规的中国僧人，就标志着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开始生根了。从此，它将逐步地以“中国佛教”的面貌而活跃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同时，魏晋时期（主要是东晋时期），中国式的佛教寺院也日益增多，寺院经济也开始出现。从而中国佛教也就初具规模了。

根据佛教史料的记载，西晋时期（公元265—316年），共有佛教寺院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多人；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共有佛教寺院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寺、僧数目的剧增，标志着佛教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公元五、六世纪间），由于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尚空谈的“义学”，重实践的“禅学”，以各不相同的风格和特点，分别盛行于南方和北方（当然，这只是就其主导方面而言的，实际上，南方也有“禅学”，北方也有“义学”，只是不占主导地位罢了）。在南方，宋、齐、梁、陈四朝的统治者，几乎都是热衷于佛教的。其间，虽有像范缜那样的无神论者出而反对佛教，但是，由于佛教得到了王朝的大力支持和庇护，它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在北方，佛教虽曾一度遭受到“二武法难”（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毁佛运动），但是，总的说来，北方佛教同样也是有着很大的发展的。这个时期的佛教，是大、小二乘并弘，经、律、论三藏共宣。不同体系的各种学派，纷纷出现。译经、注经，都远超前代。梁僧祐的十五卷的《出三藏记集》（一般简称为《祐录》），成为迄今保存完整的早期《经录》；僧祐的十四卷的《弘明集》，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佛教文献汇编。梁慧皎的十四卷的《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僧传，它为以后僧传的撰写，确定了体例，树立了规范。这些著作，对于以后的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佛教的寺院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出家僧尼，也大为增多。

根据佛教史料的记载，在南朝，刘宋之世，共有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萧齐之世，共有寺院二千零一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萧梁之世，共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多人^①；萧梁之世，光是京师地区，即

① 《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则说萧梁之世，已有僧尼“十余万”人。

有佛寺七百多所。杜牧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①，是把南朝佛教寺院的数字给大大地缩小了。经过萧梁末年的战乱，到了陈朝，寺院减少到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则仍有三万二千多人。

在北朝，佛教寺、僧最多时，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已有寺院三万多所^②，僧尼二百万人；到了北齐，大体上仍然保持这个数目^③。

从中国佛教的发展史说来，南北朝佛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

隋唐时期（公元六世纪末叶至十世纪初。其中，隋朝只有三十几年）的佛教，则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也是它的“鼎盛”期）。首先，随着王朝的统一，佛教也由南北异趣而走向统一。随着相对独立的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各派思想的渐趋“成熟”，适应时代需要、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特点（且就多数佛教宗派而言）的各个佛教宗派，也就相继地产生了：在隋代，产生了两个宗派，即天台宗和三论宗；在唐代，产生了六个宗派，即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宗派佛教的出现，标志着佛教已经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进程，至此，它确实可以名符其实地称之为“中国佛教”了（在此之前，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印度佛教”的痕迹）。而随着宗派佛教的出现，一批拥宗自重、门户之见甚深的宗派领袖人物，也就以前台“主

① 杜牧诗《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② 唐法琳《辨正论》（卷三）说：“元魏，国家大寺，四十七所；……其王公贵室、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多所。”

③ 有的佛教史料记载，北齐之世，有佛寺四万所，僧尼二百万人。显然，北魏、北齐的佛教寺、僧数字，是有所夸大的。

角”的身份，而占据了佛教的历史舞台。

根据佛教史料的记载，隋代，有佛教寺院四、五千所，僧尼三十来万人。唐代，据《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的记载，有大、小寺院四万多所，僧尼二十六万多人（寺院占有土地“数千万顷”，占有奴婢十五万人）。从唐代佛教的寺、僧数字、特别是它占有的土地、奴婢的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到了唐代，确已发展到了它的顶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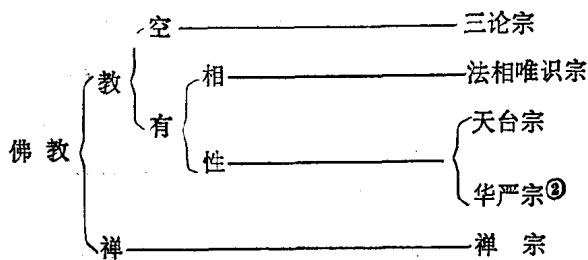
宋元（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以后的佛教，则已走向了它的衰落期。自宋元以至明清（公元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佛教各宗仍在各立门庭，分头活动，但大都是步武前人，陈陈相因，很少再有什么新的东西了（宋代禅宗，稍有不同）。

（二）从思想上说来，佛教分为小乘和大乘两大系统。小乘佛教，是早期佛教，大致说来，它还是保持了佛教的原始形态的（虽然“部派”佛教出现之后，它也有了不少变化）。大乘佛教，则是后起的，较之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许多内容可说都已“面目全非”了。从思想渊源说来，大乘佛教，是从小乘佛教的部派佛教里演化出来的，而就其阶级根源说来，大乘佛教，则是古印度由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制社会的时代产物。

大、小乘佛教，都已传来中国。自东汉以至南北朝，某些小乘佛教的学说，还曾一度流行过。但是，自从隋唐时代佛教的所谓“大乘八宗”（即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净、律、密八宗）相继创立之后，除了律宗还有属于小乘律（虽然它也已“大乘”化了）者之外，在思想理论上，便是“大乘独尊”了。除了在大藏经里还保存有相当数量的小乘《三藏》（即属于小乘

的经、律、论)外，小乘佛教的思想学说，已几乎绝响于佛教界^①。无论是出家的还是在俗的佛教学者，言必称“大乘”，行必以“菩萨”自诩。这，自然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也就是说，大乘佛教(这里，主要是指“性宗”和“禅宗”)的那一套思想理论，更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它才能够独占隋唐以后的佛教历史舞台。

现将中国大乘佛教的思想，表列如下：



在《楞伽经》里，有所谓“说通”与“宗通”的说法。后来的禅宗者流，便据此而把佛教区分为“教下”和“宗门”的两大部类。所谓“教”(“说”)，就是指禅宗以外的佛教的各种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宗”，就是指的禅宗(表中所列的“禅”，即禅宗之禅，而非禅定——禅学之禅。因为，禅定之学，仍属于“教”，而并不属于“宗”。关于禅学同禅宗的区别，详见下文)。在属于“教”的思想体系里，又分“空”，“有”两大系统。

^① 这是就汉族地区的佛教而言的。至于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在云南的傣族地区(包括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流传的则一直是小乘佛教。

^② 至于缺乏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的律、密、净土三宗，就他们的思想倾向来说，律宗近于“相宗”，净、密近于“性宗”。总而言之，都属“有宗”。

“空”，即空宗。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说来，就是由隋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空宗——三论宗所讲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所“空”的，只是事物的本体，至于现象，它还是承认其有的（只不过是“假有”而已）。所谓“缘起有”（现象），“自性空”（本体），便是这一思想的理论概括。事物的现象，是“缘起有”——“缘起”而“有”，就非真有、实有，而只是一种假有、“幻有”。事物的本体，则是“自性空”。“缘起有”法，只有假相，并无实体，所以是“空”。用僧肇的话来说，就是“不真”故“空”（“不真空”）。这是就客观现象而言的。如果就主观认识来说，“空”，就意味着不著于相。《金刚经》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于此“虚妄”之“相”上不起“执著”，这就是“空”。再有，空宗所以异于“有宗”者，不在于对于客观现象的看法上，对于客观现象的看法，空、有两宗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因为，“有宗”各派，也都认为宇宙万有都是虚幻不实的。所不同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在对本体的看法上。空宗，只承认现象，不承认本体，所谓“性空”，就是对本体的否定，他们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最高存在，精神实体。其二，在对彼岸世界的看法上。空宗对于彼岸世界（“菩提”、“涅槃”之类），也是抱否定态度的；所谓“设有一法胜涅槃者，我说亦复如幻如梦！”（《大品般若·幻听品》）便是这种观点的反映。“涅槃”，是佛教的彼岸世界，是佛教徒们所追求的最终的归宿处，而空宗却认为，不仅“涅槃”也是空的，而且，如果“设有一法胜涅槃者”（实际上，这种“法”是没有的），也同样是“空”的，这可真是一空到底了！（其实，空宗者流是非常的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在“理论”上，他们连彼岸